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25(b)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南南合作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5/234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全面报告。报告突出载述了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除其他外着重说明了联合国各实体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间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对此类合作的支持的日益重要性、主流化和制度化。报告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说明应如何进一步运用南南合作作为一种关键发展模式，在本行动十年期间加快取得进展，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由于广泛协商和技术原因，本报告延迟完成。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5/234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全面报告，包括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报告描述了联合国发展系统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在第二次高级别会议后续行动和加紧寻找全球危机多边解决办法的背景下为支持南南合作而采取的多项举措，这些危机使得更有必要采取国际集体行动，包括开展南南合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各方迫切推动采用南南发展办法，这主要是因为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了威胁，可能造成在消除多种形式极端贫穷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他成功迹象出现逆转。

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达国家约 55% 的合格人口接种了疫苗，而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截至 2021 年 7 月的疫苗接种率不到 1%，反映在 COVID-19 疫苗接种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需要更有效的南南合作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作。¹ 此外，2020 年，这场疫情使近 1 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² 在这方面，会员国高度重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伙伴关系，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所设想的那样，努力寻找多边解决办法，应对需要国际集体行动的挑战。本报告和我提交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SSC/20/2)应当从加强多边主义的广泛角度来解读，其中介绍了联合国各组织已采取哪些措施，运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动努力实现《2030 年议程》的各项承诺。

3. 报告第二节着重阐述在采取措施应对人类所面临生存威胁，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及其众多影响的背景下，南南合作和联合国系统对这一模式所提供支持的日益重要性。

4. 第三节描述第二次高级别会议所激发的促进南南合作新动力如何继续影响联合国各实体支持的会员国为实现《2030 年议程》各项目标这个总目标而采取的广泛举措。

5. 第四节重点介绍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除协调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之外，如何继续开展宣传、知识管理和其他促进南南合作举措。

6. 第五节载有相关结论，其后建议采取有关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进一步运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帮助各国在 COVID-19 疫情之后恢复和建设得更好，同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 报告主要是根据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2021 年为此目的从 23 个联合国实体和区域委员会收集的调查数据编写的。本报告对报告所述期间南南合作情况作了

¹ 世界卫生组织，“疫苗不公平损及全球经济复苏”，2021 年 7 月 22 日。可查阅 www.who.int/news/item/22-07-2021-vaccine-inequity-undermining-global-economic-recovery。

² 世界银行，“COVID-19 对全球贫困的影响的最新估计：疫情在 2021 年出现转折？”，2021 年 6 月 24 日。可查阅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updated-estimates-impact-covid-19-global-poverty-turning-corner-pandemic-2021>。

说明，但不作全面详述，在阅读时应结合我的报告(SSC/20/2)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署长提交 2021 年 6 月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SSC/20/1)。委员会关于该届会议的报告(A/76/39)还载有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大量资料，特别是关于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会员国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开展的活动。

二. 联合国发展系统各组织在人类面临生存威胁背景下向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的支持

A. 为南南合作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提供协助

8. 在 COVID-19 疫情达到大流行程度后，应对其所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影响的需求已变成一个全球紧急要务。因此，防止 COVID-19 扩散和促进复苏的政策与方案是联合国各组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全球南方一道开展政策对话、发表出版物、举办知识分享活动和交流最佳做法的核心内容。

9.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牵头制定了国家部署和疫苗接种计划，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地协调员的全面领导下为此提供了支持。这些构成部署 COVID-19 疫苗的总体规划，也是支持国家应对这一疫情的主要框架。各方也多方努力确保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 121 个联合国国家一级社会经济应对计划的主流。开发署利用其作为整合者的角色，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约占开发署所有 COVID-19 项目的 17%，其中 60%以上涉及卫生系统支助、包容性综合危机管理以及治理。此外，开发署发布了一份关于非洲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应对 COVID-19 和其他问题的报告，其中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应对 COVID-19 和其他发展挑战的重要性。

10.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COVID-19 公共卫生问题和发展紧急情况实施具体的筹资解决方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其《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于可持续复苏》中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严重影响，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1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对这一下降感到遗憾，因为减少的大部分是对工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绿地投资，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投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11. 在非洲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非洲疫苗采购工作队倡议是非洲区域合作的一个体现。在这次合作中，非洲联盟成员国利用非洲进出口银行提供的 20 亿美元融资，集体购买疫苗，以保障非洲人民的健康。

12. 2020 年，开发署非洲金融部门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在疫情期间增加汇款的区域南南讲习班。此外，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日本-开发署三方伙伴协作下发起了关于 COVID-19 的系列圆桌会议活动。开发署索马里办事处通过加速器实验室，与索马里发展行政和管理研究所合作举办了 COVID-19 黑客松活动，并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埃及)和信息获取方案(孟加拉国)合作，建设索马里青年的能力。

1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世卫组织在题为《2020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实现粮食体系转型，保障经济型健康膳食》的报告中警告说，世界并未走上到 2030 年实现零饥饿的轨道，并警告说，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对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最脆弱群体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14. 农发基金通过其农村解决方案门户网站分享创新做法和经验，以减轻这一疫情的不利影响，提高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抗逆能力。该平台上目前有 60 多个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以支持知识共享和未来对防治 COVID-19 的贡献。中国-农发基金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制指定了 400 万美元，以支持制订和交流创新解决方案、途径和方法，用于 COVID-19 疫后恢复。

15.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举办了许多政策对话和讲习班，内容涉及运用公共治理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阿拉伯国家区域的 COVID-19 疫情，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举办一场关于扶持该区域残疾人的高级别会议，以及确定该区域应对 COVID-19 的办法以及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前进方向。西亚经社会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司在 2021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联合举办了“南南合作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在 COVID-19 疫后恢复和落实《2030 年议程》过程中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活动。其目的是突显区域内和区域间南南合作在推进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具有潜力，可借以应对 COVID-19 危机之后和行动十年期间的情况。

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汇编了该区域 33 个国家为应对这场疫情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它还支持开展一系列政府间协商和评估研究，以分析 COVID-19 在国家一级和具体部门内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此外，拉加经委会还为各国政府举办了研讨会、政策对话和会议，以分享它们的最佳做法，并讨论有关这场疫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挑战。

17. 2020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为来自中国的医疗和政策专家举办了一系列南南知识分享活动，供分享他们在保障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与权利，及早应对 COVID-19 疫情方面取得的经验。这一系列活动是人口基金历来组织的参加人数最多的在线活动，有 450 名来自国家机构的参加者。

18.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通过其全球教育联盟，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 COVID-19 疫情并实现疫后恢复。这包括通过教科文组织北京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和国际在线教育学院，为远程学习提供便利和开发智能教室，从而促进 COVID-19 教育方面的南南合作。关于阻碍实现涉及普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因素，教科文组织在其《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包容与教育：全面覆盖》中重申，在 COVID-19 危机期间，40%的最贫穷国家未能支持面临风险的学习者，它敦促在学校重新开学以增进复原力和平等社会时，更好地普及教育，以落在后面者为重点。除了指出 2.58 亿儿童和青年完全无法受教育，而且贫困是阻碍普及教育的主要因素之外，该报告还强调指出了可通过南南合作对付的许多挑战。例如，许多国家仍在实施的一些政策和法律助长教育隔离以及相关的偏见、歧视

和疏离；也有一些政策和法律禁止怀孕女童上学；117个国家允许童婚；另有20个国家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禁止童工的《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

19. 泛美卫生组织与人口基金、儿基会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协作，通过虚拟会议，以“全民健康覆盖与冠状病毒病危机：挑战与应对”、“在应对疫情的同时维持基本保健服务”、“COVID-19 疫后：南方各国如何共同努力，加强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的卫生保健系统”为主题，交流了应对 COVID-19 疫情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20. 各方已作出种种努力，本着联合国全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神，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城市工作。在其海陆丝路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下，并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全球教育和培训所及泛美卫生组织联合举办了关于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活动，以应对 COVID-19 疫情。2020 年，在城市项目和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下，与大约 30 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实体举办了近 50 次其他在线和面对面能力发展培训活动和知识分享交流。这些培训和交流涉及公共卫生、电子商务和农业价值链发展等主题，在全球达到了超过 320 万的浏览量。此外，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还通过其城市项目，动员各城市伙伴捐赠个人防护设备，并与开发署国家办事处合作，协调部署了 100 多万多个口罩，2020 年惠及 22 个国家的人民。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及其合作伙伴和其成员各机构协助调集了 36 000 多只口罩、12 000 个检测工具包和仪器以及价值 3 364 000 美元的其他医疗用品，惠及 20 多个非洲国家的人民。另外，2020 年，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通过其关于重建地方财政空间的倡议，促进交流各种经验和适应性发展解决方案，为孟加拉国、加纳、墨西哥、摩洛哥、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干达的 6 个城市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交流想法和专门知识，以应对 COVID-19 造成的损失，增加地方经济发展机会。

21. 作为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协调中心，该办公室进一步借助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专门知识，促进会员国的能力发展，以应对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疫情。

22. 南南银河平台是该办公室存储和管理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知识储库，这个平台为调查了解全球南方如何应对 COVID-19 提供了支持，为对付这一疫情提供了一个动态知识来源，使各国能够相互学习。在联合国各伙伴和各国政府的协作下，该平台还被用于组织 20 多次知识分享活动，促进就 COVID-19 应对办法进行交流。

23. 该办公室及其非洲司调集了 260 000 美元，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非洲联盟发展署合作，向非洲国家提供 COVID-19 检测包，并组织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它还和西非工商会联合会合作，设立并主持一个全大陆讨论小组，供非洲人就应对非洲 COVID-19 疫情的可能方式交流信息。此外，该办公室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共同组织了一系列磋商和一次网络研讨会，以交流信息，促进非洲妇女就她们对抗击 COVID-19 的贡献进行对话。

24. 该办公室亚洲及太平洋司就南南合作在该区域应对这一疫情并实现疫后恢复方面所起的作用展开了一项调查。对这项调查作出答复的所有 17 个国家都得到了支持，其中多数还向邻国和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提供了支持。

25. 作为应对 COVID-19 的进一步行动，该办公室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发起了一项数字创新挑战，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扩大数字创新。这项挑战于 2021 年 6 月启动，将确定可扩展的创新数字解决方案，使全球南方的国家、社会、社区、机构和个人能够应对这一疫情导致的连锁影响。

26. 该办公室的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联体司组织了一次区域间政策对话和评估，探讨行动十年期间在 COVID-19 应对和疫后恢复总体背景下推进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联体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公共政策领导力和体制安排。在高级公共政策官员和专家、区域联合国实体，包括区域委员会、相关专题联盟、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智囊团的参与下，与会者讨论了各种专题，例如加强区域间、区域内和次区域合作的机会；国家架构在南南合作、东东合作和三方合作中的作用；使这些机制更具效力和效率的关键要素。

27. 该办公室和开发署通过南南全球思想者倡议，与巴林合作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虚拟区域讲习班，讨论内容涉及通过 COVID-19 疫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自阿拉伯国家区域和其他地区约 18 个国家的 33 名代表不同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发言者参加了讲习班。

28. 该办公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伊斯兰开发银行于 2020 年 3 月共同举办了发展合作总干事高级别论坛第十二届会议，主题为“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趋势、机遇和挑战：在 COVID-19 背景下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包括发展合作部门和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负责人在内的 160 多人。这次活动就应对 COVID-19 疫情背景下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做出更大努力以加强会员国的医疗保健系统，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建设恢复和复原能力，制定有利于私营部门更广泛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29. 在西非和中非，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 404 多名志愿人员为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共和政府组织实施疫情应对方案提供了在线支持。

30. 在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团强调了南南合作应对 COVID-19 疫情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南南合作的团结精神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疫情期间从其全球南方伙伴那里获得急需的药品、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A/76/39)述及这一疫情显示了南南合作的更大价值，强调了这一疫情导致需要处理的一些新的南南合作优先事项，包括更有必要加强合作以改善保健系统、社会保障系统和众多其他公共服务。

B. 促进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31. 最近，包括洪水、干旱和野火在内的极端气候事件出现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发达国家更严重，这也促使发展中国家及其伙伴更有兴趣通过南南合作

进行集体应对。过去四年中，继 2019 年秘书长召集举行气候行动峰会以及同年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呼吁就气候变化开展更多行动之后，联合国各组织采取了措施，通过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办法。

32. 开发署正在中国、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伙伴协作下实施“沼气、生物量和太阳能三边合作：斯里兰卡农产品加工业向可持续能源利用过渡”项目。该项目使参加者能够在国际一级参与并合作转让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小户农民为重点。

3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举办了一个关于强化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以建设脆弱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能力的项目，协助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和塞舌尔制定针对具体国家的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办法协议。来自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和塞舌尔的团队合作发表了 13 篇科学论文。知识交流最终导致产生了一系列出版物和工具，目前全球南方各地的从业人员都在使用这些出版物和工具，包括组织和分析信息以规划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办法选择。³

34. 粮农组织-中国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跨界动物疾病防治的南南合作项目促成在参与国(柬埔寨、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分享牛和猪疾病管理方面良好做法以及转让相关技术。此外，粮农组织通过 Lazos 应用，促进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棉花部门的可持续、包容性生产系统，以期将男子、妇女、青年和各种机构与促进可持续农村发展的信息联系起来。

35.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中国自愿基金致力促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知识和技术的转让。该基金资助了一个项目，将太阳能光伏技术解决方案从中国转让给斐济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岛屿和领土区域，以通过扩大使用此类解决方案来促进这些岛屿和领土的可持续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该项目促成制订了从中国向太平洋岛屿和领土转让光伏技术的综合方案。

36. 贸发会议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改善其运输系统(运输基础设施和物流)，确保更便利进入世界市场，同时促进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37. 南南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已变得更加重要，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严重的影响，但要应对这一挑战，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三. 联合国各实体执行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建议方面的活动要点

38. 在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中，国际社会表示赞赏联合国各实体为将南南合作纳入其战略框架和工作计划主流而开展的

³ 见 www.iisd.org/projects/alive-adaptation-livelihoods-and-ecosystems-planning-tool。

工作，并鼓励各实体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以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和相关的政府间发展目标。

A. 继续加强联合国实体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能力

39. 联合国各实体遵循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的重要建议，而且其履行建议的方式也是按照大会关于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相关决议，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向联合国发展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前沿。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各组织继续通过加强自身在该领域工作的机构能力，为更有效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奠定基础。为此，它们继续着力制订各种战略和设立专门单位和方案，将人力和财政资源专门用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此作为支持会员国相关能力发展倡议的基础。

B. 利用体制机制和其他机制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0.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的要求，对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采取更加系统化或制度化的方式。这些实体在排除一个长期存在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个障碍是发展中国家对可与之合作的适当合作机构和潜在的合作伙伴都缺乏了解，同时也不了解有哪些有效发展政策和良好做法值得在其他管辖范围采用，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发展中国家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进行相互学习，了解实现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

41.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各实体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地参与由一系列体制机制和其他机制推动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包括试点项目、英才中心、数字平台、网络、智库、数据库、协调中心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具体详述如下。

42. 2020年和2021年，粮食署在中国农业农村部种子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实施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试点项目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巩固了在厄瓜多尔、刚果、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取得的成果，并在秘鲁推出了一个新项目，从而扩大了覆盖范围。该试点倡议旨在利用粮食署中国英才中心和中国研究机构的专业知识，加强弱势小农户的应对能力和生计。

43. 开发署继续支持对全球南方发展解决方案进行系统性知识编纂，并将这些解决方案和良好做法与南南银河数字平台相连接。开发署还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合作建立了南南全球思想者网络，该网络汇集6个网络，涵盖250多个全球南方智库，目的是促进关于南南合作及全球南方发展解决方案的对话、新思维和循证研究。2020年，全球南方智库发表了9篇关于南南合作(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协作)国家体制安排的研究论文。开发署还在每个区域局设有一个非全时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联络人，与开发署国家办事处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联络人进行协调。开发署非洲局金融部门中心促进了非洲国家在实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区域项目以及在落实非洲区域局非洲南南合作议程过程中作为南南合作积极伙伴的作用。开发署首尔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政策中心为开展世界范围的讨论，包括有关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讨论，发挥了召集作用，而开发署在非洲的加速

器实验室网络则筹划并编纂了 21 个面向非洲的南南合作解决方案和创新方案，以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44. 西亚经社会为交流执行《2030 年议程》和相关国际协议方面的良好做法提供了支持。西亚经社会制定了支持其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包括建立一个管理捐助方对黎巴嫩提供援助的电子平台，以期使为该国克服多重冲击实现复苏而开展的三方合作更有效率和更透明，此外还设立一个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务互换机制，以期通过债务人、债权人和捐助方之间的协作安排，将用于偿还外债的国家偿债付款转换为用于实施气候适应型项目的国内投资。目前正在与埃及、德国、约旦和突尼斯等许多利益攸关方开展相关工作。西亚经社会还致力于建设阿拉伯可持续发展目标门户，以提高各国的统计能力，促进就监测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情况数据和统计开展区域协作。

4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战略和方案管理司的能力发展和伙伴关系科担任了整个亚太经社会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协调中心。亚太经社会还支持开展合作和同行学习，以帮助亚太地区特定发展中国家克服编写自愿国别评估报告方面的系统性挑战。例如，亚太经社会发起了一项自愿国别评估结对方案，在北亚和中亚的 4 个发展中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试行，目的是交流知识、经验和实际建议，便于准备和追踪落实国别评估。

46. 工发组织根据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模式执行了 130 个项目。各国际性联盟和多个捐助方支持其中大多数项目，这些项目的地理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有些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建立和管理工业园区的能力。

47. 粮农组织设有专门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办公室，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则设在粮农组织 5 个区域办事处中的每一办事处。粮农组织在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下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城市对城市倡议，该倡议体现了一种机制，便于交流全球南方可持续、包容性城市粮食系统创新政策与做法方面的良好实践。

48. 泛美卫生组织与阿根廷一道实施了关于在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和区域层面加强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检测和监督的三方合作项目，该项目帮助 119 名参与者建立了检测和监督抗菌素耐药性的实验室能力。

49. 上述例子表明，联合国各组织继续利用体制机制和其他机制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C. 持续地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发展系统战略框架的主流

50. 除上述体制机制及其他机制外，联合国各组织继续推出各种发展战略。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开发署、环境署、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等许多联合国实体报告说，它们已制定战略，使其能据以按照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所欢迎并敦促各实体继续实施的做法，继续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所有这些战略共同标志着从一种暂定特例方式转向更遵循方案程序而且更有重点的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使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能

够在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业务活动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例如，开发署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力求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并运用其知识和经验推动可持续发展，从而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开展南南合作。

51. 在区域层面，亚太经社会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所有部门的工作主流，作为实现亚太经社会 2021 年方案计划目标和支持成员国执行《2030 年议程》的重要模式。亚太经社会各办事处和区域机构广泛采用了这些模式来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拉加经委会秘书处经由一个附属机构即南南合作委员会，将南南合作纳入其工作方案，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西亚经社会则采用项目方式开展所有活动和方案。它的项目有一种特定的形式，可借以确保所生成的所有知识都包含发展援助方面的内容。项目中如果不包含这一内容即不予执行，而含有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提案则列为优先要务。

52.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之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加强了与区域和国际发展行为体的接触，以加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执行《2030 年议程》和区域发展框架(如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中的影响。

D. 建设会员国制定、实施和管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的人力和机构能力

53. 关于建立或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以管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建议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中影响最大的建议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来改善公共服务提供并满足其他需求，那么许多前景看好的行动计划就无法落实。

54. 根据成果文件，开发署在如下重要方面为各国提供支持：通过其区域中心和国家办事处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创造有利环境，以及建立全球南方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和交流机制。它公布了开发署国家办事处制定国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的指导准则。制订这些准则的目的是支持开发署工作人员协助各国政府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制定和实施其国家南南合作政策，并根据国家优先重点加强面向南南合作的国家生态系统。

55. 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与开发署结成伙伴关系，通过制定法律条例和战略以及建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成果框架，加强其体制计划。开发署首尔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政策中心协助卢旺达合作倡议制定了卢旺达南南合作战略。开发署在非洲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区域项目支持建立国家南南合作架构，如建立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解决方案和网络的报告机制，以促进区域对话，包括开展国家配对活动，从而推动非洲国家成为积极的南南合作共享伙伴。

56.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借助“优于现金”联盟，鼓励会员国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此提供一个平台，推进全球南方各国之间就基本公共服务付款数字化进行多国学习，增加当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对机会的利用，获得气候融资，并扶持对金融普惠采取有利于穷人的市场开发办法。

57. 粮农组织主要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的制定、执行、协调和扩大方面支持个人和组织的能力发展，促成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例如，它建立了中国、荷兰和粮农组织之间的一个三方合作项目，以加强中国合作伙伴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了解、研究和培训能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该项目在泰国的支持下促进了阿富汗动物健康实验室的技术能力发展。在非洲，粮农组织分别帮助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设人力和机构能力，以制定和实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该项目支持根据国家政策汇编了经验、知识产品和服务目录，以促进这两个地区的南南合作，重点是农业和粮食部门。

58. 农发基金向摩洛哥政府拨出 100 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实施由国家牵头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并在与其他非洲国家分享其专门知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笔赠款旨在支持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的政策制订、价值链发展和“农业增长支撑”理念采纳。该基金提供了资金，以扩大摩洛哥伊夫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英才中心的影响力，并且将马达加斯加取得的成功扩展到包括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在内的其他国家。

59.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合作，启动了非洲联盟委员会和东盟秘书处之间关于南南合作的高级别直接对话。它还与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和非洲联盟发展署制定了合作框架，以支持非洲国家和本地区实现《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议程》。

E. 由联合国实体支持的资源调动和伙伴关系举措，其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速可持续发展

60.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利用其召集各方的权威，在吸引广泛各类行为体参与和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方面发挥推进作用。亚太经社会 2020-2022 年资源调动战略纳入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将其视作一种重要的伙伴关系和发展合作模式。在这方面，亚太经社会和中国在一个称为“中国-亚太经社会合作方案”的总括性筹资与合作框架下开展了合作。据此，亚太区域 23 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 2020 年向亚太经社会 5 个区域机构提供了财政支持，以实施能力发展方案，促进关于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技术转让、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数据和统计以及灾害信息管理方面的南南交流。

61. 世卫组织为在南非建立首个 COVID 信使 RNA 技术转让中心提供了支持。这项举措旨在扩大 COVID-19 疫苗和其他医疗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包括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合作伙伴、Biovac、Afrigen 生物制品与疫苗公司以及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2. 2020 年，西亚经社会设立了一个预算外基金，并由设在科威特的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为其调集资源。它继续从外部伙伴和捐助方调集资源，支持发展中的和最不发达的阿拉伯国家。

63. 开发署欧洲和中亚区域中心与许多战略捐助伙伴(捷克共和国、波兰、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和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方案交往,以测试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南南合作、东东合作及三方合作,包括资源调动以及与私营部门接触模式。

64. 在粮农组织,除了核心预算拨款外,大量非核心财政资源经由信托基金,专门用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其中最大的基金是粮农组织-中国信托基金(由中国政府提供 8 000 万美元),以促进农业部门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2020 年,粮农组织与中国在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方案第二阶段开展了协作,中国又投资了 5 000 万美元。第三阶段始于 2021 年,旨在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为实现粮农组织的愿景、全球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力。它将借鉴从之前几个阶段汲取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东道国政府对于项目实施、私营部门参与和发展农业-工业连续体方面的充分参与和政治承诺。

65. 农发基金建立了 51 个伙伴关系,以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筹集了 1 000 多万美元的南南投资。此外还举办了 30 多个关于可持续农业、农村金融、水资源管理和市场准入等问题的经验和知识分享以及能力建设讲习班。为加强全球层面的伙伴关系和接触,农发基金设立了全球参与、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集司。该司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股不仅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而且也致力于扶持伙伴关系及资源调动。

66. 正当世界在探索疫情后重建得更好之道的时候,世界银行在《2020 年世界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时代的贸易换发展》中提醒读者注意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价值链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并开始追赶发达国家方面起到的作用。根据该报告,全球价值链可以继续促发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轻贫困。然而,发展中国家将需实施更有效的改革,以促进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而发达国家则需推行开放、可预测的政策,所有国家也都需要承诺重振多边合作。多边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是成功模式的基本要素。

四.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政策支持、宣传、知识管理和其他促进工作

67.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继续向政府间机构和联合国实体提供秘书处和政策支持。该办公室就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编制了分析性报告;为政策对话和政府间进程,包括为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和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提供了支持;协调了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连贯一致支持,包括制定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国际社会落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中所载的建议。

68.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期间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再次作出了承诺,从而使该办公室增添了活力,得以继续在全球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内促进、倡导、协调和支持这类合作。我提交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SSC/20/2)以及开发署署长的报告(SSC/20/1)都详细说明了为加强该办公室的协调作用和影响而采取的行动,本节重点介绍该办公室的促进工作。

69. 除了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外，该办公室还实施了许多促进举措，组织了宣传活动，并充当了总部和国家层面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知识枢纽角色，以促进切实的交流。这些举措包括促进南南技术转让、建立数字协作平台、记录良好发展做法、建立伙伴关系和筹备多种知识产品。

70. 该办公室在全球南南发展中心项目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2020年启动了4个由需求驱动的小额赠款项目，包括在罗非鱼价值链中可持续渔业领域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小农户提供赠款；通过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效技术共享，开发高性能建材和建筑；在乌兹别克斯坦促成可持续旅游业发展和消除贫困，为此在基层地方决策人员间进行交流；卢旺达的可持续竹子业发展。

71. 截至2021年6月，南南银河平台已拥有一个由600多个良好做法和创新解决方案组成的数字储存库，有300多个机构已经注册使用，其中包括55个会员国和45个联合国方案、基金和专门机构。

72. 2020年9月，该办公室的亚太司参与共同举办了纪念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的活动。这次纪念活动是与泰国政府和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联合举办的，柬埔寨和中国政府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重点是南南志愿服务，视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办公室的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在太平洋地区共同举办了第一次这类纪念活动，得到了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全球南方伙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参加。

73. 2020年，亚太司还参与了联合国区域一级的改革进程。亚太司主张南南合作在联合国系统相关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促进了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方法纳入共同国家分析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进程。

74. 2020年，亚太司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在《南南配对：2019-2020年最佳做法》第二卷中记录了来自7个国家和14个组织的24项最佳做法记录。南南公共服务创新网络研讨会上介绍了“配对”发展解决方案，其间相关解决方案的供求双方进行了会面。

75. 2021年6月，该办公室的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联体司通过发展协调办公室分别在各区域派驻的人员，向这两个区域的所有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出愿意加强对感兴趣的伙伴国家提供支持，以便对这两个区域的南南、东东和三方合作的趋势和机会进行国家评估。这次评估工作将尤其包括评估相关国家的合作处于哪个阶段；记载成功的政策和实际解决方案；认定在建立、加强和巩固南南合作、东东合作及三方合作中的主要挑战和机遇；为国家利益攸关方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这项行动也符合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其中促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帮助各国建设必要的人力和体制能力，以制定和执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国家发展政策、战略和方案。

76. 该办公室还通过其众多知识产品起到了南南合作知识交流中心的角色，这些产品很丰富，包括南南合作专题报告、《南南理念》文件中所述创新研究以及以解决方案为侧重点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良好做法》丛书以及“南

南合作在行动中”系列。2020年，该办公室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出了26种知识产品，南南合作解决方案数据库得到了扩大，增加了197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良好做法，而且已记载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做法》第三卷中。第三卷已译成5种语言，使其能为更多国家和发展伙伴得以查阅其内容。

77. 该办公室、巴西合作署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于2021年3月共同举办了为期4天的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管理能力建设的虚拟项目规划讲习班和培训班。来自5个区域16个国家的与会者分享了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管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78. 该办公室在其“**Youth4South**”倡议下发出呼吁，邀请各方提交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青年创业构想，其结果是，各方提交了超过455项倡议和想法。在围绕2020年国际青年日举办的国际青年创新和创业对话中介绍了最突出的创业倡议。超过54万名年轻人和其他参与者参加了在线对话。启动**Youth4South**研究金支柱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者提供获取奖学金和研究金的机会，以推进他们对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国际发展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的中非农业合作国际方案向来自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年轻研究员提供了全额奖学金，用于攻读农村发展和管理研究硕士学位。

五. 结论和建议

79. COVID-19大流行的一个突出效应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南南合作在应对危机和其他挑战方面的现实意义。南南合作的突出特点已更加明显，包括注重通过知识和经验分享推动人力和机构能力发展；开展政策对话和政策协调；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创新筹资；建立旨在强化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各种框架。

80. 本报告说明了在报告所述期间，对南南合作的支持已很好地纳入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报告内还显示，包括COVID-19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危机导致更迫切需要采取国际集体行动应对挑战，而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就不可能克服这些挑战。因此，现在鼓励各国支持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特别是在驻地协调员领导下的国家一级举措。世卫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为在非洲及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生产COVID-19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而建立的伙伴关系目前尤为重要。特别需要在疫苗生产商、疫苗生产国和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解决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疫苗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此外还鼓励联合国相关组织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17促进形成这种伙伴协作关系，以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和其他发展挑战。

81. 面对消除贫困、饥饿和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出现的倒退，会员国日益强烈呼吁联合国各组织提供援助，加强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人力和机构能力，促进实现《2030年议程》。为此，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应当在其即将出台的战略框架中包含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加强国家机构的更有力支持，根据会员国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要求，酌情规划和管理南南合作。此类工作应立足于一个强健

的成果框架，而这一框架必须酌情与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监测和报告框架相一致。

82. 联合国各组织一直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战略政策和方案。它们还支持建立体制机制，包括英才中心、智库、数字平台和网络。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和其他相关实体应利用全球南方英才中心和智囊团的专门知识，查明在南南合作中最为活跃的机构；确定各组织所侧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组织已订立有效政策和良好发展做法的部门，以及各组织已取得的发展成果；通过南南银河在线平台分享这些信息。这些行动的目标应当是收集关于所取得的成果和可推广的良好做法的循证数据，以便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速实现 2030 年议程。

83. 负责为促进实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的拉加经委会南南合作委员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协作工具。同样值得赞扬的是开发计划署署长报告(SSC/20/1)所述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间南南合作区域规划、执行和报告工作。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各区域办事处应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实体协作，推动在全球南方形成这种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区域协作框架。联合国各组织应酌情利用这些框架开展政策对话、政策协调以及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跨界和区域间方案工作，目的是调集全球南方的人力和其他资源，同时营造有利环境，增加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各级获得教育、医疗保健、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其成果应当通过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加以扩大。

84. 联合国各组织一直支持会员国落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所载的建议。然而，联合国各机构亟需进一步响应第二次高级别会议的呼吁，提供支持，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高生产能力。因此，联合国相关组织应优先提供支持，借鉴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做法，在农业、工业和能源等战略部门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即将举行的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可以为南南合作提供进一步推力，使更多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在本十年行动期间处理本国优先事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类举措的成果也应当通过南南银河平台进行分享，以宣传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本行动十年期间为使最不发达国家脱离当前状况所作的贡献。此外，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中要求会员国支持改进基础设施连通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各方所作的回应需要予以更多的重视，为提高妇女和女童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也应当如此。

85. 联合国各组织还一直支持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调动资源，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当前鼓励联合国相关组织加大对南南举措的支持力度，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为此，联合国各组织应进一步促进创新筹资机制，其中包含来自北方的传统发展援助，辅之以私营部门资金和全球南方主导提供的资源，如国家和区域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86. 为开展联合国机构间协作以支持会员国南南举措而建立的框架令人鼓舞。然而，在当前的十年行动期间，应敦促联合国各实体加强机构间协作，支持以协调一致方式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战略，包括为此在所有区域建立区域协作平台。